

他曾在中央苏区持枪掩护彭德怀脱险，也曾在重庆面对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给周公馆布下的天罗地网，巧妙地与敌特周旋斗争，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急刹车后将周恩来送上朋友的汽车，然后将敌特引到戏院傻等；他也曾因《新华日报》事件和较场口血案而截获敌特送给周恩来的恐吓信及子弹；为防止敌特暗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得逞，他通过地下党组织监视厨房，并亲尝所有饭菜，确保毛主席和客人的饮食安全。因此，他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被称作“老虎”，这名中共隐蔽战线的神秘人物便是开国少将龙飞虎。

近日，《法制晚报》记者专访到他的女儿龙铮，她将父亲保卫毛主席、周恩来的那些故事一一道来；也将周总理夫妇抚养她长大，父亲为表谢意，将两只樟木箱送给周总理而被“无情”退回的故事和盘托出。



龙飞虎之女龙铮接受记者专访

摄/记者 郭谦



1937年龙飞虎在延安身着八路军军装照

截获给周恩来的恐吓信 内装子弹

开国少将龙飞虎之女龙铮讲述父亲保卫工作经历

暗查机枪连长投敌案 持枪掩护彭德怀脱险

1946年出生的龙铮，虽然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身边长大，与亲生父母的接触机会并不多，但是她熟读历史，尤其对于父亲的革命故事烂熟于心。

据其介绍，1915年2月13日，父亲龙飞虎出生在江西井冈山脚下永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特委部队配合红军作战，在龙源口大捷后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泽东、朱德上了井冈山。”龙铮如是说。

1930年，龙飞虎15岁，担任了红军师部通讯班长。参加了攻打长沙战役、龙岗战役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一次送信回部队途中，父亲龙飞虎冲锋在前，孤身一人突然与十余名白匪军相遇；他急中生智，迅速占领附近一块高地隐蔽起来，朝天放了一枪，高声喝道：‘不许动放下枪，举起手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伙流窜的敌兵，被这突来的喊声吓破了胆，乖乖地放下武器，并听从他的指挥把枪栓卸下，每人背着枪站好队。”龙铮讲述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伙敌兵看到龙飞虎只是一个端着枪的小红军时，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龙飞虎孤身一人押着这群俘虏回师部后，立即在军营中传为美谈，受到了师政委彭雪枫的赞扬。

龙飞虎因为屡次作战勇敢，出席了在苏区召开的第一届青年大会，并被选为政治保卫局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经过系统的训练，他成了保卫局的侦察员。“红军当时的人员是鱼

龙混杂，有旧军队过来的人，有贫苦的农民；红军的武器装备差，生活条件苦，因此思想不坚定者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上到师长下到士兵随时都会有开小差者，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龙铮指出。

保卫局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查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龙飞虎接到任务被派到机枪连当伙夫，查明机枪连长的真面目。这个连长是旧军阀队伍中过来的，好吃懒做，军阀作风严重，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民主作风很是不满。龙飞虎在机枪连干了两个月后，终于查明了真相，就在机枪连长拉队伍投敌叛变前夜，及时地报告了上级，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这场阴谋。为此，龙飞虎立了功受了奖。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有一次战斗中，队伍被冲散，彭德怀同志遭遇了白匪军，将他追到一条川里路旁一个亭子时，眼看就很近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飞虎、黄赤波、覃应机几名保卫干部从侧面飞身赶来，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由两个人并排着紧挨着彭德怀往前跑，最终使彭德怀安全脱险。”龙铮称，她在一个老红军的自述里看到了这个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龙飞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长兼便衣侦察队大队长。他们一路上不断打探消息，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情报。部队到达陕北前，就是侦察队员们找到了刊有陕北红军消息的报纸，提供给党中央，为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会师决策提供了依据。

张学良打趣龙飞虎是儿童团 借军纪督察处打探剿共情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主的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时，龙飞虎在红军大学被挑选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自此，龙飞虎开始了长达十多年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工作。

在谋求解决西安事变期间，有一次张学良陪周恩来吃饭，席间，张学良问周恩来，“这次能否派几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到东北军帮助工作。”周恩来说，“我这次带了这几个卫士。”张学良看着龙飞虎问：“你多大了？”“今年二十一，是个老红军！”龙飞虎答。张学良笑着说，“还是儿童团

嘛！”众人都被龙飞虎的率真引的开怀大笑。

后来，龙飞虎等四人被派到东北军的军纪督察处和特务团协助工作。他们住在军纪督察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军纪督察处由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任处长，红军方面，罗瑞卿和杜理任科长、龙飞虎等人任科员。

军纪督察处在西安城内权力很大，对开展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有利。他们也经常到南苑门“剿匪司令部”了解有无反共的情况。后来，龙飞虎穿着东北军少校副官的军服安全撤出西安，回延安任西北保卫局情报侦察科长。

一身国民党军官打扮搭便车 护送千余名青年学生到延安

1937年12月，周恩来叫龙飞虎和宣侠父去南京，在南京住了五天就赶到临汾与周恩来会合。这时太原已被日军占领，龙飞虎又陪周恩来来到了风陵渡，周恩来回延安，叫龙飞虎再回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傅厚岗，龙飞虎见办事处门上贴了一张条子，告诉已迁址下关，到了下关却又没找到人。

日军已轰炸了丹阳，情况很紧急，龙飞虎幸运地搭上了最后一班车，到了蒲口，却没车了。恰在此时他碰上一辆拉煤的汽车，他一身国民党军官的打扮，拦住了车，声称从前线刚回来，就此搭上了便车，车上还有一个国民党兵带着老婆搭车，龙飞虎一路上就跟国民党兵打哈哈到了徐州。在徐州碰上西行的杜聿明的装甲部队，又搭了便车到了郑州，从郑州再坐火车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在武汉，龙飞虎任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交通科副科长。他身上带着朱德和叶挺的私章，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名义与国民党军政部门打交道。抗战初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刚成立统一

战线，还可以找国民党领到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品。这样，凡是给八路军的物资，龙飞虎就在收条上盖朱德的私章，给新四军的物资就盖叶挺的私章。只要有武器就去申领，不论多少，领一点是一点，待物资集中后，龙飞虎负责带领押运副官将物资运往八路军和新四军驻地。

“延安当时办了一些印刷厂，棉毛纺织厂、皮革厂、地毯厂、肥皂厂、银行，所需的设备，大批的粮食被装、无线电器材、枪支弹药都经我父亲他们押送去，还有千余名青年学生去延安也是我父亲负责护送的。”龙铮说。

她还称，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的指挥下，1939年，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交通科长的父亲和其他同志到香港和越南河内、海防等地，转运由宋庆龄和海外华侨募捐支援八路军的救护车、药品、汽油、无线电器材等重要物资。在白天敌机轰炸、沿途散兵土匪袭扰的艰苦条件下，龙飞虎和他的同志们将物资安全运回延安，对抗击日寇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活动在周公馆附近的特务假拍照 刹车掉包让特务在戏院傻等

1939年12月，龙飞虎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保卫科长、副官处长，周公馆的馆长兼党的支部书记。负责保卫周恩来办事处的安全。“小楼坐落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公馆侧面的一条胡同里，马路直修到戴笠公馆的门口，周恩来上下汽车得徒步走过这段狭窄的胡同。”龙铮说。

当时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同志住在一楼、二楼和二楼的一部分。二楼住有两家国民党特务，传达室内有一半也是特务在把门。而大门外有个卖香烟的特务也在常年监视着周恩来，附近还有许多便衣特务装成买橘子、甘蔗的小贩，坐茶楼喝茶的客人密切监视着周公馆的一举一动。迫于政治上的压力，特务们不敢公开绑架中共代表团的人员，但经常绑架与中共代表团接触的地下党同志和爱国人士。

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要做好周恩来的安全保卫工作，是极其艰难的。为此，周恩来每次外出时，龙飞虎都佩戴着两支驳壳枪，形影不离地陪伴其左右，这给特务极大的震慑。为了镇压特务，恐吓敌人，龙飞虎搞来架照相机，不装胶

卷，对频繁活动在周公馆附近的特务假拍照。特务怕登报“曝光”，收敛了许多；为了甩掉特务盯梢，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员免遭不测，周恩来则与龙飞虎仔细研究行车路线，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七拐八弯把特务甩掉。

“皖南事变后，特务们更加疯狂了，在曾家岩‘周公馆’的前前后后，安下了50多个专职特务。我们每个人外出，总有两个特务盯梢；周副主席的汽车一开动，特务的汽车马上就跟上了。但是一切监视、盯梢都不能束缚我们，周副主席依旧积极地活动着，为此，我们曾多次与特务巧妙的周旋与斗争。”龙飞虎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有一次，周恩来要会见一位朋友，他们就事先请这位朋友将汽车开到两路口公园旁边的一条僻静的公路上等着。他们顺着公路向前跑，快到接头地点的时候，汽车开足马力，一股劲冲下了坡，没等特务的汽车下得坡来，他们的汽车在事先约好的地点，猛一刹车，周恩来立即下车跳上朋友的汽车走了。然后龙飞虎将车开慢，让特务的汽车再跟上来，将其领到当时重庆最有名的国泰大戏院门口，将车一停，让特务们在那里傻等。（下转 a19版）